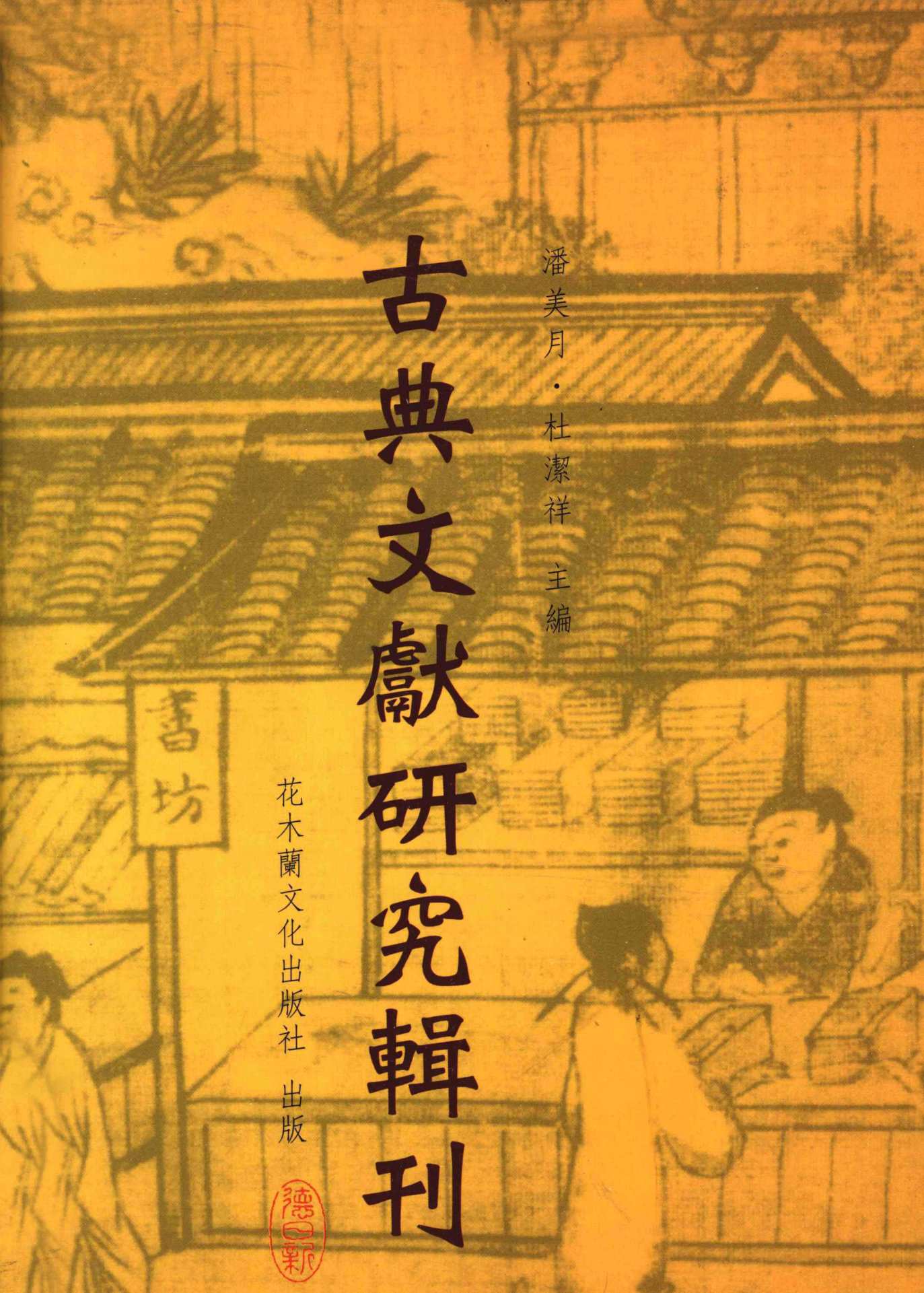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30 冊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之研究

呂迺基 著

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

官廷森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之研究 呂迺基著／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
官廷森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民96〕

目 1+148 面+ 目 2+13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編：第 30 冊）

ISBN：978-986-6831-23-2（全套精裝）

ISBN：978-986-6831-21-8（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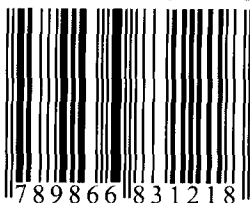
1.（明）何良俊－傳記 2.論叢與雜著－中國－明（1368-1644）

－研究與考訂 3.筆記小說－研究與考訂

072.6

96004480

ISBN - 9866831218



9 789866 83121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 編 第三十冊

ISBN：978-986-6831-21-8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之研究 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

作 者 呂迺基 官廷森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呂迺基，民國七十七年自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現任教於崇右技術學院。
論文指導：黃志民教授

提 要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起〉一文中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明代嘉靖、隆慶年間松江府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正是符合以上條件的筆記小說。該書初刻本三十卷，成於隆慶三年（西元一五六九）；續撰八卷，合為三十八卷，重刻於萬曆七年（西元一五七九）。全書共分十七門，計有經、史、雜記、子、釋道、文、詩、書、畫、求志、崇訓、尊生、娛老、正俗、考文、記曲、續史。除《紀錄彙編》的摘抄本外，其中書、畫、詞曲三部分曾被單獨輯出，稱為《四友齋書論》、《四友齋畫論》、《四友齋曲說》（或作《曲論》）；詩的部份，也曾被明周子文的《藝薈談宗》所摘抄。此外，何良俊尚有《何翰林集》、《書畫銘心錄》、《何氏語林》等著作可與《叢說》相互印證補充。

由於學術風氣的轉變，自明以來，《叢說》在各時代的價值與地位每不相同。如果將它比喻作獨立的生命體，藉著前人的引用情形及評價高低，可以看到一部筆記小說的歷史，正如一個生命的起伏升降。而在被徵引、討論及影響的部份，在戲曲主張方面，主要是「崇《拜月亭》而抑《西廂記》、《琵琶記》」、「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企圖振興北曲以與南曲抗衡」。在書畫方面，由於何良俊長期與文徵明相與評論書畫，學者往往將他的畫論視為吳派早期畫論的代表作。而在顯現歷史實況上，更可補正史的不足，如記王陽明歿後數十年內，講學者引發的種種後遺症；記倭亂前後，留都南京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窘態；記松江府風俗的侈靡；記嚴嵩的憐才下士；這些鮮活的實例，都是輔助《明史》的最佳材料。

作者簡介

官廷森，臺灣省臺北縣人，一九七三年生。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政治大學中文系、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畢業。曾獲《青年日報》「愛說孝」徵文比賽散文類特優獎、臺北縣語文競賽中學教師組朗讀第一名、全國語文競賽中學教師組朗讀第三名。曾任政治大學語言中心華語教師、臺北縣師鐸獎司儀、全國教育博覽會司儀。現任板橋高中國文教師、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教學師資培訓講師、臺北縣語文競賽朗讀組評審暨集訓指導老師。

提 要

《世說新語》在晚明時期（嘉靖至清初）造成空前盛況，受到士人相當的重視與喜愛。就目前所知而言，單是《世說新語》原作的刻本，便至少有十八種。而《世說新語》之續作、仿作（世說體著作），更高達三十餘部之多。此外，嘗對《世說新語》原作、續作、仿作進行注釋、評點者，亦有十三家左右。至於為其撰作序、跋的文人，更是不勝枚舉、無從計數。如此盛況，乃前代所無。由此可知，《世說新語》在晚明確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所謂季世，大抵均有若干類似之時代現象與特質。惟魏晉與晚明二者，實有更多相通之處。晚明文人便已自覺此點，如王宇〈清紀序〉論季世，即獨舉漢末魏晉與晚明對映。而晚明世說體著作乃至清言小品之蔚盛，更證明魏晉與晚明之關聯。因此，若以《世說新語》與魏晉時期的部分特質，觀照晚明之文學、思想、文化等現象，當不無所得；則晚明世說體著作，實頗值得吾人注意。

然而，現今對晚明時期的探討，不論是文學理論或士人風氣，皆鮮少觸及晚明世說體著作。晚明性靈思潮之興起，固與王守仁心學（王學泰州學派）之啟發及前、後七子擬古風氣之刺激有關，然其為何以此種面貌呈現？晚明文人為何以率真任性為處世準則？他們心中的理想人物典型又是哪些？而「清言」作品何以大盛於晚明？凡此問題，皆可自晚明世說體著作獲得啟發。

在研究方向上，本文著重於魏晉與晚明彼此關係之探討，透過《世說新語》與晚明世說體著作的對照、比較，呈顯出晚明世說體著作的特色，並進一步反映出晚明時期之士人風尚與文學興趣。本文第二章探討晚明世說體著作之興起背景與原因；第三章分析晚明世說體著作之形式體制；第四章則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聰慧、賢媛等向度，論述晚明思想風尚及文學現象。希冀藉由對晚明世說體著作的研究，發掘出其於晚明文學、思想、文化史中的意義與價值，進而對整個晚明學術思潮、士人風尚及文學理論，有更為深刻的了解與掌握。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何良俊的時代背景、潮流及家鄉	3
第一節 時代背景	3
第二節 時代潮流	7
第三節 家 鄉	12
第二章 何良俊的家世、生平及交遊	17
第一節 家 世	17
第二節 生平及其他	21
第三節 交 遊	32
第三章 《四友齋叢說》概述	41
第一節 版本及成書	41
第二節 前人的引用及評價	42
第三節 學術價值	49
第四章 何良俊的書畫理論及其他	65
第一節 對書畫的態度及其創作	65
第二節 《四友齋叢說》的書論	70
第三節 《四友齋叢說》的畫論	74
第四節 《四友齋叢說》畫論的價值及影響	82
第五章 何良俊的戲曲理論及其他	89
第一節 《四友齋叢說》曲論的背景	89
第二節 《四友齋叢說》的曲論	92
第三節 《四友齋叢說》曲論的影響與地位	99
第六章 何良俊的詩文創作及其詩文論	109
第一節 《何翰林集》的詩文創作	109
第二節 《何翰林集》的詩文論	113
第三節 《四友齋叢說》的文論	118
第四節 《四友齋叢說》的詩論	122
第七章 結 論	131
參考及引用書目	135



目

錄

第一章 緒 言	1
第二章 晚明世說體著作之興起	5
第一節 魏晉風流之企羨	5
第二節 短文小說之好尚	7
第三節 知名文士之推動	8
第三章 晚明世說體著作之體制	11
第一節 門類篇目	13
第二節 注文、小序、按語	18
第四章 晚明世說體著作之內容	31
第一節 德 行	32
一、道德教化之編撰理念	35
二、細大不捐之選材標準	37
第二節 言 語	43
一、清	45
(一) 清之內涵	45
1、清與汗濁	45
2、清與雅俗	46
3、清與玄虛	49
4、清與風流	50
(二) 晚明之清	52
1、名士風流之清	53
2、山林隱逸之清	56
(三) 晚明世說體著作與晚明清言之關係	57
1、清言名義	58
2、清言形式	59

二、韻	63
(一) 以疵爲美	64
(二) 多情率真	66
(三) 任達放誕	69
(四) 嗜酒耽色	71
第三節 政 事	75
一、廣任才智之士	77
二、措意民生經濟	82
三、加強國防邊政	88
第四節 文 學	89
一、文學詞章	90
(一) 詞義兼備、文質彬彬	90
(二) 文發於意見、詩本乎性情	91
(三) 嚮慕魏晉詩文風韻	93
(四) 推尊白居易、蘇軾	94
二、玄學佛理	95
三、博學多識	99
第五節 智 慧	102
一、智	102
二、慧	107
第六節 賢 媛	110
第五章 結 語	117
參考書目	125

前 言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起〉一文說：

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亮，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註1）

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正是這類筆記小說中的一部，它提供許多清晰的明代史料。其中書論、畫論、曲論三部分，早經單獨輯出，肯定它在這方面的價值；近年來，由多種期刊論文的徵引，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中約有一百四十餘人曾參考它的記載，更證明《叢說》實具有廣泛的參考價值。

雖然有豐富的內容，但「弱水三千，取一瓢飲」，是一般人使用筆記小說時所抱持的態度，當他們在其中尋找合適的「一瓢」時，多半無暇留心「弱水」的整體風貌；在學術分科越分越細的今日，學者也往往難以照顧到本科之外的知識，因此何良俊一人，在各學科研究者各取所需的情況下，分成作曲論的何元朗，寫畫論的何良俊，擅掌故的何翰目……等等；雖由此可見《叢說》的多方面貢獻，但將何氏其人其書分割成數個獨立個體的結果，卻令吾人無法獲得整體的了解。

當筆者進一步翻檢相關資料時，發現其中記載失實之處不少，或對何氏的生卒年及事蹟不詳（註2），或對《叢說》的成書年代不詳（註3），或對《叢說》的徵引失

〔註1〕轉引自謝國楨〈明清野史筆記概述〉一文，頁97。

〔註2〕《明史》卷二八七，頁7364，何良俊傳中記其「少篤學，二十年不下樓」，過於誇大，與事實相去甚遠。又，記何氏「年七十始返故里」，殊不知何氏享年僅六十八歲。

〔註3〕俞崑《中國畫論類編》頁108，推斷《四友齋畫論》成書的年代「約公元1530年前後」，將成書時間提前約四十年。時代定位的錯誤，實足以影響畫論史的正確性。

實〔註4〕、評論不當〔註5〕；因此，在何氏的四部著作——《四友齋叢說》、《何翰林集》、《書畫銘心錄》、《何氏語林》——俱存的情況下，本論文希望以何氏本人及其《叢說》為研究對象，作一全面性的探討。

明代嘉、隆年間，畫壇方面，吳派文人畫家及畫論，在與浙派競爭的過程中逐漸取得優勢；曲壇方面，南曲取代北曲成為戲曲界的主流，而沈寂已久的曲論也出現轉機；詩文方面，則正處七子派、唐宋派、江南傳統清麗詩文三派相互較勁之際。

《叢說》中書畫、戲曲、詩文三部分，不但透露何氏個人的見解，也深刻反映出當時的實況。嚴格說來，這些隨筆式的記載，雖不足以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將零星的記載稍加整理歸納，並輔以《何翰林集》及《書畫銘心錄》諸資料，倒也能為何氏的理論與實際勾勒出大致的輪廓，因此本論文特關四、五、六三章，分別專章探討。

何良俊並非明代最著名的學者，《四友齋叢說》也不是最重要的筆記小說，但無疑的，其人其書都有助於學者更進一步了解明代。本論文願意誠懇的將何良俊其人其書的真實面貌呈現出來，並期待學者的批評。

〔註4〕劉熙載《曲概》頁435，其引用的「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為王世貞《曲藻》語，劉氏誤作何良俊《叢說》語。

〔註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七，子部，雜家類存目四，頁3~749，僅以朱國禎《湧幢小品》及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的數條批駁，即評斷《叢說》「可以徵信者良亦寡矣」，顯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第一章 何良俊的時代背景、潮流及家鄉

明代自朱元璋驅逐蒙元，重建漢人政權，開啓歷史上的新紀元，其間歷經十六帝，享國近三百年。雖然政治、武功均不足以與前代相比，卻是中國文化變遷中的重要轉捩點。何良俊生於此一時期的正德、嘉靖、隆慶年間，活躍於江南的蘇松、南京，所見、所感都留下珍貴的記載。我們在檢閱其著作之前，對他所處的整個大環境作一概括了解，相信有助於以下各章節的研究。

第一節 時代背景

時代的大環境，足以影響個人的思想言行，而敏銳的筆記小說家，也對時代跳動的脈搏留下深刻的記錄。以下分就政治、國防、經濟三方面，對何良俊所處的大環境作一簡介，同時，也以《叢說》中的各項記載，與此節作一對照印證。

壹、政治方面

由武宗到世宗、穆宗，是明代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生於正德元年，卒於萬曆元年的何良俊，恰好縱貫這個時代，茲對此一時期的政治發展略述如下。

孝宗是明代中期政績稍佳的皇帝，武宗繼位，一反父道，信用宦官劉瑾，排斥忠良，導致朝政大壞。宗室安化王寘鐫以討劉瑾為名反於慶陽，幸朝臣楊一清及太監張永同心討平，才未釀成大禍。此後劉瑾伏誅，武宗又信用江彬，不改荒嬉淫樂的本性。覬覦帝位的寧王宸濠，於正德十四年趁機舉兵於南昌，雖旋為王守仁所討平，武宗卻假「鎮國公朱壽」之名，御駕親征南下，車駕所至，苛索供奉，沿途地方官吏及百姓備受騷擾。正德十六年，終於結束他荒淫無道的統治，而明代政治也逐步步入衰途。

武宗無子，以外藩興獻王世子入承大統，是爲世宗。即位之初，便下詔議興獻王的祀典及專稱，引起朝臣間朋黨的衝突，即所謂的「大議禮」。主張尊興獻王爲皇考者，多加官晉祿，而反對者，非下獄即廷杖；此事越演越烈，滿朝文武幾乎皆捲入風潮，卒至朝中士氣遭受摧折，政府元氣因而大傷。

嘉靖中期以後，大議禮之爭暫平息，而世宗又將興趣轉向神仙方術，斤斤於祀典的改定，日日以醮禱爲能事，數十年不上朝問政。嘉靖二十一年，嚴嵩以善撰醮祀青詞而得帝眷，授內閣大學士，把持朝政達二十年之久。其子世蕃也爲世宗信任，父子相助爲惡。朝臣中有膽敢與他們意見相左者，多遭貶戍或斃於杖下。四十一年，嚴嵩以罪狀暴露而罷，世蕃伏誅。此時，北方的俺答、南方的倭寇雖氣焰稍息，但政府長期的府庫枯竭（註1）、政風敗壞（註2）、人才摧殘、軍事不振（註3），使得國本早已動搖。

四十五年，世宗死，穆宗繼立，在位僅六年。他本人可稱中材之主，閣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也均有政事才，吏治稍見澄清，然而互相傾軋、黨同伐異的結果，開啓了明末意氣用事的門戶之見。

所謂上行下效，皇帝的不理政事，劉瑾、嚴嵩等的招權納賄，殘害忠良，自然導致政府各級行政機關的因循苟且、瞞上欺下。所幸百餘年來的士氣尚未完全摧折，各方志中少數的名宦仍在地方補苴罅漏，使得明王室在內憂外患的風雨飄搖中，仍能搖而不墜。

此後除張居正變法的短時期外，明代政治已呈每況愈下的局勢，以下的庸主庸臣皆不足以扭轉頹勢，只有留待新興的清王朝來收拾殘局。

貳、國防方面

將才重在長期培養、充分授權，士卒重在嚴格訓練、撫循恤給。由明代中、晚期多次戰役中所顯現的軍政敗壞、戰力薄弱、調度失當，可知朝廷內外雖仍有可用的直臣與將帥，但皇帝與執政者多未能用心於此。因此，國防上破綻百出，戰事屢次失利。國祚能綿延兩百餘年，已是萬幸。

明代重要的外患有三，一爲北方蒙古的後代韃靼、瓦剌；二爲來自海上的倭寇；三爲東北的滿州。滿州是明末最後興起的勢力，取明王朝而代之。以下僅就明代嘉靖前後的兩大外患作一概述。

（註1）參《何翰林集》卷十九〈與王槐野先生書〉；卷十一〈送大司徒孫東穀考滿序〉。

（註2）參《叢說》卷十二·史八。

（註3）參《叢說》卷十一·史七。

一、俺 答

元王朝退回北方之後，蒙古分裂為韃靼、瓦剌兩部，兩部互為興衰。英宗時，瓦剌部也先繼其父脫歡而起，於正統時大舉入侵，遂有土木堡之變。孝宗時，韃靼部達延汗統一大漠南北，復居河套，於是寇患轉烈；直到世宗初年，北方幾無寧歲。此後，達延汗年老厭兵，別部酋長俺答代興，入據河套，連年寇邊，成為嘉靖年間北邊最大的外患。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犯延安府，殺掠人畜無算。邊臣曾銑建議恢復河套，當國的首輔夏言力贊其說，無奈朝中諸臣心懷怯懦，嚴嵩又久已覬覦首輔之位，復套之議既被阻撓，曾銑、夏言也為嚴嵩誣陷而相繼論死。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舉入寇，四方震動，京師戒嚴。所幸各地勤王之師陸續集中，俺答又無意攻城，在城外恣意殺掠之後得意而去。此後二十餘年間，俺答又數度大舉入寇，軍政敗壞的明室終無可如何。直至穆宗隆慶五年，愛孫心切的老俺答才受封為順義王，結束北邊二十餘年的長期騷擾。

二、倭 寇

江南是明室經濟的命脈，倭寇的大肆騷擾，無異予明室致命一擊。其實，遠自元代，日本的海盜即已出沒中國沿海。明初，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黨，也不少亡命海上，為倭寇作嚮導侵略中國。此後，中國本地的奸民與倭寇時相勾結，殺戮居民，劫奪貨物。李定一《中華史綱》說：

倭寇是介乎內亂與外患之間的變亂。因為真正的倭人，不過十之二三，大多數為中國人，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紳、富商大賈、官僚地主等各色人等，他們各為自身利害而與倭人勾串，騷擾劫掠沿海各省。（註4）

嘉靖初，明廢市舶司，禁止對外貿易，倭人流落不能回國的，多變成海盜。而沿海的奸商又因積欠倭商貨價過鉅而拒不償還，倭寇又大恣劫掠。在治倭有功的朱纨被誣下獄自殺後，倭寇之勢更大。嘉靖三十二年，大舉入寇，沿海城鎮衛所相繼淪失。而朝廷所派的總督巡撫雖屢更其人，然而或無權、或無能，均無治倭的辦法；其中尤以嚴嵩黨羽趙文華最為跋扈，文華貪暴兇橫，侵餉冒功，實為江南倭寇坐大的禍首。由於沿海防務的長期廢弛，及將帥的處置不當，倭寇縱橫千里，如入無人之境；竟能以數十人的小群直逼南京城外（註5）。

倭寇肆虐，沿海的松江府首當其衝，由《雲間雜誌》的兩條記載，可見當年的實況：

（註4）《中華史綱》頁445。

（註5）參《叢說》卷十一·史七，頁4320。

嘉靖癸丑（三十二年）倭奴內犯，吾郡久未聞鼓樂聲矣，忽南城內一小戶成婚，偶用鼓吹，按院命即擒解，時吳都憲悟齋公（吳時來）為郡司理，稟曰：「留此一些，還像太平光景。」得免捕。（註6）

倭亂後，夜聞鬼泣，雖眾喧鬧，泣自若也，第云：「倭子來矣！」便寂然。（註7）

其後文華免職，詔以胡宗憲總督軍務。宗憲先平倭寇耳目徐海、汪直，倭寇在蘇浙無法立足，便轉掠閩粵沿海。嘉靖末年，終為俞大猷、戚繼光所討平。

綿延十餘年，禍及東南各省的倭亂雖平定，然而江南財賦重地的嚴重創傷，及種種後遺症，卻為江南民生加上了更沈重的負擔。

參、經濟方面

自隋唐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即逐漸由北方轉向東南沿海地區，歷經宋元，明代江南經濟已取得絕對的優勢；而江南賦稅徭役的合理與否，也恰與政治的清明、政權的穩固成正比。

明初的賦役制度，規畫頗為精密。太祖曾下令詳查全國戶口田地，編制「黃冊」和「魚鱗圖冊」，賦役均依二冊為準。因此，在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劬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餽餉不仰給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註8）百姓的負擔並不太重。其後黃冊及魚鱗圖冊因年久失修，經辦的糧長、里長及官紳相互勾結舞弊，徵課不能得實，賦役之法漸壞。其實，早在宣宗宣德年間，周忱巡撫江南之時，富室兼併農地的情形已頗嚴重，「詭寄挪移」成為規避賦役的通行法術。農民困於賦役，或相率逃亡，或投靠豪門，爾後此風有增無減。嘉靖年間，由於應付俺答、倭寇的軍費增加；又有世宗本人崇信道教，祠典營建的龐大支出，國用更見不足，屢有「加派」的額外徵課；後來倭亂雖平，而額外徵課仍未見減少。此後除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稍稍紓解小民的負擔外，賦役日重，國勢日衰，終至國家滅亡。

經濟問題較其他問題更為複雜，且牽涉更廣，除了賦稅之外，還包括貨幣、工商業、土地政策、農田水利、國際貿易……等。歷來學者往往由於觀察的角度不同，因而產生出入頗大的看法。例如吳永猛在《中國經濟發展史導論》中說：

總之，因明代土地制度不善，貨幣制度亦惡，工商政策亦不善，人民

〔註6〕參《雲間雜誌》卷七，頁113。

〔註7〕參《雲間雜誌》卷二十四，頁122。

〔註8〕參《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貨一，頁1877。

既不能普遍改善生活，反而擔負重稅，又飽受通貨膨脹之苦。以致「內憂」，再加上「外患」，軍費吃緊，入不敷出而加耗再三，迫民揭竿而起，官兵缺餉亦掠奪為禍，加速大明江山易色。（註9）

從另一個角度看，明代仁宗洪熙、宣宗宣德之間，在東南某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已經有著演變為較大規模企業經營的跡象。大商業城市星羅棋布，交通發達，商賈絡繹，加上海外市場的開拓，中國的絲織品、瓷器等，已成為亞洲國際市場的主要產品。而大規模的國內外貿易，又刺激了貨幣需要量的增加，在原有的紙鈔、銅錢外，錢幣也逐漸成為主要的貨幣（註10）。

此外，黃河、淮河、運河，及江南的大小河川，雖時常氾濫，但整治河川的工作並未停止。而農田水利雖荒廢，然不致敗壞，正是廣大農村在困境中仍能勉強生活的原因之一。

總之，與前代相較，明代的經濟優劣互見。優點是工商業日漸發達、大型城市的興起、物質文明更見推展、資本經濟已逐漸萌芽；缺點是土地、貨幣、工商諸政策的規畫不當，導致貧富差距日漸加大、農業人口逐漸流失、苛捐雜稅無理盤剝，而明末軍事的敗壞，更加重經濟情況的惡化，終於在軍事、經濟雙重失利下，明政權土崩瓦解。

第二節 時代潮流

人生在世，很難不受時代潮流的影響。面對各類潮流，每個人的反應不同，或是順應潮流，或是不隨潮流，或是力圖留住上一波的潮流，或是批評潮流下的流弊，或是開啓潮流。而何良俊的各項主張，恰巧兼具了以上各類型，倒也是有趣的現象。以下分別就明代（尤其是何氏前後）詩文、理學、書畫、戲曲各方面的潮流作一簡介，並可與以後各章節的內容相互比較，以見何氏在詩文及理學上的不隨潮流，並批評潮流；在書畫上的順應潮流，並開啓潮流；在戲曲上的力圖留住上一波潮流。

壹、明代的詩文

明代詩文，大抵有擬古與創新兩種不同的觀念在相互激盪，而以擬古為主要潮流。就時代而言，從洪武（西元 1368～1398）以至成化（西元 1465～1487），百餘

（註 9）《中國經濟發展史導論》頁 232。

（註 10）參黃師志民〈明清詩文的發展〉一文，頁 216。

年間，是擬古思潮逐漸具體的時期；從弘治（西元 1488～1505）以迄萬曆（西元 1573～1620）前半，亦百餘年，是擬古觀念進而為有力之文學運動的階段；雖然其間有些摹擬標的不同而形成派別，但擬古的取向是一致的；從萬曆後半以迄明末，乃擬古運動的反響，以公安、竟陵為中心的創新的文學觀念是其主流，而擬古一派的後起也對原本的主張有所修正轉變〔註 11〕。

明初的文壇，以高啓、宋濂為詩文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時期福建的林鴻、高棅出，漸漸形成獨重盛唐的詩觀，而高棅的《唐詩品彙》，就是他們主張的具體化。這種擬古思想，成為七子派崇盛唐的先驅。此後，文壇上的主流是三楊的「台閣體」，及李東陽的「茶陵詩派」，雖都能風靡一時，但對以後的影響畢竟有限。

弘治、正德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出，企圖以北人的豪邁性格與文風，矯治平庸衰弱的台閣文學，揭舉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一時天下風從，造成極大的聲勢。後七子繼興，嘉靖年間，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雖曾提出「變秦漢為歐（歐陽修）曾（曾鞏）」的口號以資對抗，但始終未能取七子派而代之。及至萬曆中期以後，公安派、竟陵派的相繼出現，才給予七子派嚴重的打擊。

當前七子李、何一派詩文風靡文壇的時候，南京文壇的領袖顧璘、朱應登、黃省曾等，都曾表示支持與學習的態度；然而「這種鄉下佬的文學，單軌式復古的土氣，本是難以侵入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知識層的」（註 12），蘇州文壇領袖沈周以下的文徵明、唐寅、祝允明等，雖然聲勢並不足以與七子派相抗衡，也並未標榜何種文學主張，卻一仍江南詩文清麗的傳統，以清新的情趣，來表達真實的感情。主要活動於嘉靖年間的何良俊，年代已晚於他們數十年，但從《何翰林集》及《四友齋叢說》中，仍可看出七子派的擬古主義，並未能完全籠罩江南文壇；無怪乎連秀華等的《中國文學史》要說：

但由於這種堅持秦漢、盛唐的方式不能滿足江南的文學家，……（王世貞）而積極地以南北文學的折衷為目標。（註 13）

貳、明代的理學

自從南宋朱熹集理學大成之後，程朱一派就逐漸取得學術思想上的正統地位。明代中葉以前的大儒，如方孝孺、曹端、吳與弼、胡居仁、薛瑄，大體上，仍是沿

〔註 11〕參黃師志民〈明清詩文的發展〉一文，頁 231。

〔註 12〕參連秀華、何寄澎合譯《中國文學史》頁 221。

〔註 13〕連秀華、何寄澎合譯《中國文學史》頁 222。

襲程朱的學說，而無新的創闢。他們共同的長處，乃在躬行實踐，一毫不肯苟且；短處則在於謹守程朱而無法創新，使得思想界的空氣稍嫌沈悶。直到英宗時，吳與弼的學生陳獻章出，明代理學中反程朱的學派才算正式成立。蔣伯潛在《理學纂要》中稱他是「上繼陸象山，下啓王陽明，爲理學史上一大轉捩。」（註14）

繼陳獻章而起的是王守仁，他以學問而兼事功，成爲明代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人。「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學說，也在數十年間，幾乎席捲全國整個思想界；一般學者都認爲終明之世，幾成「王學」世界。王學雖能充分發揮個性，其弊則易使人流於放浪自恣；而末流往往空談心性，束書不觀，思想也難免流於空疏貧乏。無怪乎清初大儒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都大表不滿，或作有限度的修正，或作猛烈的抨擊。

其實，早在王學傳播的初期，何良俊活動的正、嘉、隆年間，它的流弊即已產生，《明儒學案》中的許多學者，如羅欽順、何塘、黃佐等，都曾批評它理論上的許多缺陷與不足。至王學末流，流弊更顯，一般假藉王學而附庸風雅者的實際醜態，及講學者的引禪入儒，都在筆記小說中有所反映，以下摘錄數條以見一斑。

明徐樹丕《識小錄》的〈講學〉條記載

靈濟宮講學莫盛於嘉靖癸丑（三十二年）甲寅（三十三年）間，蓋徐階、歐陽德、聶豹等主之，縉紳附之，輒得美官。有臣貴弟某欲藉此以爲名高，一日當赴會，與大閤飲醉忘之矣，從者掖上之馬，目昏昏不開明矣，至講所，不能成揖，擁而即席，鼻如雷，眾不敢言，比晚畢事，從者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人傳以爲笑端。（註15）

何良俊的同鄉好友陸樹聲在《清暑筆談》中說：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疏；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註16）

明陳于陸在《意見》〈講學〉條中說：

學問只當平居講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黨與，朝廷之上公然設會；徼名亂政，罪之尤者。今之講學，舍正學不談，而以禪理相高，浸成晉代之風，司國論者其懲之。（註17）

〔註14〕《理學纂要》頁130。

〔註15〕《識小錄》頁194。

〔註16〕《清暑筆談》頁3011。

〔註17〕《意見》頁3045。